

第四章、個案分析

本章為個案分析，即透過案例的分析說明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在進行分析前，要先說明的是，在本章中，阿玉這個個案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來「說明」前述的理論架構，使讀者更便於理解本文所提出的解釋觀點，而非「驗證」前述的理論架構。換言之，透過阿玉這個個案的說明，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能更具體的被了解，但絕不意謂著我想透過阿玉這個個案，驗證我的解釋架構。而之所以選擇阿玉做為說明的代表，除了因她是我第一個接觸的個案外，也因在訪談過程中，我和她的互動最為頻繁與長期，且在眾多受訪者中，她的各式傳播媒介的使用程度亦是最深，故而我想她是個很具代表性的說明案例。至於我所提解釋架構的適用性，非我這個研究所能處理的重點，應是未來我和其他有興趣學者更進一步努力的目標。

前面我們曾經談到，不同的媒介文化情境，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而人們的各式行動，即是透過這些文化工具箱的使用策略組合而成。換言之，如果我們要了解文字時代口語人如何使用文化工具箱，首先必須先了解其腦中所具備的文字工具箱為何？而如果要了解其所具備的文化工具箱，又必須先回到形塑其文化工具箱的文化情境討論。故而，影響文字時代口語人口語表達的媒介文化情境，是我們首先觀察的重點。

至於要從哪些面向觀察影響文字時代口語人的文化環境因素？在第三章第三節的解釋架構中，我們曾經提到，在解釋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行為時，不只要考慮其目前所處的媒介文化情境，更須進一步探討其早期所處媒介文化，及個人生命經歷所產生的影響。故而在這個部分，我們主要從報導人目前所處的情境、個人早期所處的媒介文化情境，及其個人生命經歷三大部分來做說明。

第一節 報導人阿玉所處的媒介文化情境

前面談到，在文化情境的說明部分，本文主要以口語和文字/電子偏向文化為分析的單位。口語偏向文化的特色為，以社群為組成單位，活動範圍小，思考與談話內容，與所處情境緊密結合，社群規範力量大，耆老為主要糾紛仲裁者，知識取得源自於實作，所得知識內容大半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文字/電子偏向文化的特色為，重個人，輕集體，人們的溝通行為，不再受限於時空的限制，移動的範圍更加廣闊。以文字律法為主要歸依，識字成了必備的一項文化工具，抽象的知識廣為流傳且大量出現。

如果說媒介文化偏向為我們的分析單位，那麼阿玉早期和目前所處的文化情境，又是屬於那個媒介文化偏向呢？

一、個人生命經歷

阿玉現年七十五歲，目前住在台南縣柳營鄉，根據阿玉的說法，她七歲生父就去世，九歲生母也病亡，可說是命運多舛。不過在很小的時候，親生父母就因家中女兒眾多，將她送人當養女以招弟妹，所以雖然親生父母早逝，但對阿玉的影響並不大；另外，由於養母家境還不錯，故而阿玉早年的生活過得還算不錯。雖然後來養母真的生了好幾個弟妹，不過還是一直將阿玉視為是親生子女。阿玉常說養母對她很好，像是養母曾想過把她送到學校讀書，不過因為她對讀書沒興趣，經常逃學，坐不住，讀不到三天就棄學，所以到現在一個字也不識得。

阿玉養母家算是大家庭，阿玉小時候跟奶奶一起住，奶奶因為看她做事蠻靈巧的，常叫她幫忙洗自己的「水煙炊」（長煙斗），不過調皮的她常邊洗就邊玩起水來，所以常遭奶奶罵。至於養母則是很少叫她做什麼粗重的工作，最多就是撿甘蔗、洗碗或做一些簡單的農事等，所以阿玉不太感受得到生活的辛苦，及至十八歲嫁給先生，才開始了阿玉所說的「辛苦的生活」。

阿玉先生家貧，沒有自家的田地，主要以幫地主種田繳租營生。爲了一家子的吃飯問題，當時公公向許多地主承租土地，讓家人在這些土地上種植各式農作物，及至收成後，再將收成農作物的一大部分，拿到地主家繳租，故而生活相當清苦。

雖然飯菜每天都由阿玉負責烹煮，但她很少有機會拿著金錢購買商品，因爲當時家中的經濟大權，主要是掌握在公公手裡，主要的飯菜原料，都是公公到市場購買。每天阿玉除了需在清晨四點半左右起床，煮飯給一大家子的人吃外（包括公婆、三個小叔、四個小姑、大伯、大嬸、先生），還要和先生及大伯、小叔一起出門，到各個農地幫忙農事，等到太陽下山回家時，又要忙著張羅全家大小的吃喝。剛到先生家時，阿玉就因爲不太會做這些家事和農事，常遭婆婆責罵，一直到後來透過不斷自我學習，才慢慢學會各式家事及農事的技巧。

阿玉先生家一直以佃農的身份耕種，到後來政府公佈「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等政策，讓佃農得以用低價購買自己所耕種的土地，阿玉婆家才開始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也開始存錢買更多的土地和房子。阿玉說，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種起來的感覺很不一樣，心情也好很多，會更打拚(努力)。

阿玉共生了兩對子女(即兩男兩女)，在阿玉到農地幫忙時，主要就是由婆婆幫忙照顧小孩。原本阿玉一家人和公婆、大伯、小叔、小姑等人一起住，後來小叔一個個結婚後，就開始要求分食(分家)。

分食時，阿玉家分了幾塊農地，其中有塊農地是和大伯共同持分，由於那塊土地，剛好位在住戶密集的地方，阿玉先生就跟大伯商量，兩家一起合起來，以農地的名義申請興建房舍。所以現在大伯和大嬸就住在阿玉家的隔壁，兩家人的關係非常密切，常常有事就會彼此幫忙。

阿玉雖然沒有讀書，但先生倒是具有國中學歷，而且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日語相當流利，也能以日語和日本人溝通。阿玉先生後來轉行從商，說日語這項技能對他的工作幫助很大，像是爭取日本客戶及與日本客戶商談，阿玉先生都不假他人之手。

在訪談過程，有好幾次機會和阿玉先生對談，我發現由於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阿玉先生對於日據時期治安的良好，及人民生活的平和穩定，給予高度評價，反倒是對於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時的各式作為，多所批評。由於阿玉先生對於國民黨一直抱持著負面的態度，時常在阿玉面前批評過去國民黨政府的作為，再加上阿玉平常與先生的互動相當密切，故而連帶著也影響了阿玉的政治傾向，使得她在政黨傾向上，較支持泛綠陣營。

阿玉先生原先也是從事耕作，由於種田相當辛苦，需要大量勞力，阿玉先生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後來計畫轉途(改行)，從事其他行業。初時阿玉先生先在青果社當職員，後來有人邀他合夥從商，再轉途經營不織布工廠，一直至今。

阿玉一生工作，以種田為主，由於農田就在住家附近，所以阿玉的活動範圍，也以住家附近為主。幾年前，阿玉先生開始在印尼和大陸設廠，所以阿玉經常有機會到印尼和大陸去探望先生，活動範圍也大多了。

阿玉現在和大兒子及媳婦一家人就住在原先分食的住宅中，她常說自己從五十歲以後就好命了，因為沒在工作，都在玩。事實上，就我的觀察，阿玉並沒有到哪裡玩，或從事什麼娛樂活動，經常的，她只是呆在家裡看看電視，或到住家附近找鄰居和朋友聊聊天，甚而她也不是沒勞動，每天她還是煮一家子的飯、洗一家子的衣服，偶爾種種花草。但對於阿玉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可能是因為早年生命經歷的勞苦吧，所以現在不用再從事那些辛苦的工作，就被她視為是一種玩樂的狀態。

從阿玉的人生經歷，我們可以得知，阿玉的生命發展，一直處於一種人際互動密切，親友關係緊密的大家庭架構中，在娘家跟著養父母及奶奶一起生活，結婚後則是依著先生的大家庭為生，兒子長大娶妻後，再跟著媳婦一家居住，即便是其後分食，親戚大多仍住在附近，往來仍是相當頻繁。

而由於生活在一個範圍狹小，人際互動較頻繁的環境中，再加上未受正式學校教育，不識文字，無法閱讀及獲得生活以外的知識，主要的資訊取得及溝通管

道，以人際傳播為主，致使阿玉的生活概念，深受週遭人物及情境的影響，像是先生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就影響了阿玉的政黨傾向，使她較支持泛綠陣營。而其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也與所處生活情境及工作環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阿玉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顧家庭及忙於農事，從事了三十幾年的耕作活動，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大自然密切結合，她常說自己是靠天公吃飯的，天候的變化對她而言，相對於其他工作的人來說，顯然重要的多了，因為只要天氣不好，她的生活所得就有很大的影響。

故而阿玉的生活常識非常豐富也與所處的情境密切結合，像是她可以看著太陽的移動位置及影子，說出大概的方位和時間；看著天空雲朵的變化，預測接下來的天氣變化；而對於種植農作物的相關事物，也具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像是何時該種什麼農作物，遇到什麼病蟲害該如何處理等。甚至於她的許多分類方式，由於未受過正式學校文字教育的影響，主要還是依所處文化情境的分類方式為之，像是她對於年歲的方式，就是採用生肖的方式來做說明及運算，而非目前台灣普遍盛行的西元或是民國制。

阿玉生命中較大的轉變，是由先生從商開始，由於先生在印尼和大陸經商，時常帶著她到各地旅行，也讓她有機會接觸不同國家的人群和事物，擴展了她的世界觀。有次阿玉孫女在翻看地理課本時，阿玉看到課本上的地圖告訴我，這是世界地圖，我們台灣在這張圖上只是小小的一個點，不過她不知道在哪裡。顯然阿玉的世界觀已和生活在口語文化中人有很大的不同了。

二、早期文化情境

(一)媒介情境

1.傳播工具

阿玉說，她年輕時候，台灣還沒有電視和電話，許多的政府政策，都是靠鄰居或是村長挨家挨戶的告訴大家。像是那時的「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就是村長到家裡告知和說明的。另外，有時為了謝神，廟方或信奉者會請「歌

仔戲」或「布袋戲團」演出，也會放映露天電影來娛樂村民，村長偶爾就會利用那個時候，跟大家宣佈一些事。至於收音機部分，阿玉說，她很早就看到有人用收音機聽歌和聽新聞，不過因為以前工作很辛苦，每天從早忙到晚，早上四點半起床煮飯，七點多出門耕種，常常工作到很晚，回家後又要煮飯，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聽，而且當時也沒錢可以買收音機。故而他們主要的傳播工具就是口語。

2.交通工具

至於在交通工具的使用部分，根據阿玉的說法，台灣有些運輸建設，事實上在很早就已建構完成，像是她說，在日據時代，台灣的鐵路交通，其實已經相當發達，那時有些人就會搭著火車到北部去賣「丫咪」（走私物）了。不過在那時候，她倒是沒搭過火車，問她為什麼不搭火車，她說搭火車要花錢，而且那時候錢是由她公公管的，她又沒錢，再加上她們的工作地點，就在住家附近的農田，沒有遠行的需求，大部分時間只要步行就好，所以她沒搭過火車。我問她那幹嘛不騎腳踏車，阿玉說，那時候的腳踏車很貴，當時的嫁妝要是有台腳踏車，就是件非常神氣的事，她先生家當然沒有腳踏車了，所以她通常就是在居家半徑五公里的範圍內活動。

3.物質工具

阿玉常說，她們以前人的生活真的非常苦，那時候的電力供應並不是那麼充足，也沒有那麼多農耕機器的發明，主要還是使用人力或是一些較初級的人造工具，像是鋤頭等，解決一些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而大部分物資的取得，也以人力為主。像是阿玉曾經談到，她初嫁到先生家時，半夜四點半就要起床到井邊擔水。當時台灣沒有瓦斯，所以煮飯菜的燃料，主要來自於田裡的乾葉子或柴火，而她的工作之一就是捆折甘蔗葉當柴火。不過當時大家還是會利用手邊一些垂手可得的物資，變造出一些玩具以供娛樂，像是她常和姐妹淘一起撿拾白墨，在地上畫格子，玩跳圈圈，還有用布包米做成的沙包玩。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阿玉早年所處的文化情境，主要以口語媒介，做為傳播和思維的工具，由於口語媒介易消失的特質，再加上當時台灣受過正式文字教育的人口並不多，可供記錄事物的工具也很少，故而人們主要靠腦中記憶來記錄事物，像是阿玉會「用心」去記公婆的忌日和紅白包的金額。

當然，有時也會仰賴週遭一些受過文字教育的親人幫忙，像是阿玉的先生受過日本教育，所以在一些需要記憶的生活鎖事，阿玉偶爾可以仰賴先生的幫助，但因先生後來出外工作，大半時候，阿玉仍是需要靠自己解決，故而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下，阿玉會發展和使用出一些輔助記憶的思考工具。

例如阿玉會使用很多俗語、諺語，來記憶一些氣候變化時所可能造成的結果，像是有天清晨我陪她散步時，剛巧空氣中佈滿了霧氣，阿玉隨口就說了句諺語「春霧曝死鬼，夏霧作大水」¹，告訴我晚一點天空就會下雨。

另外，由於所處交通工具、電子媒介的不發達，再加上工作環境及資訊取得不易的關係，阿玉主要活動範圍就在住家半徑五公里以內，也形成阿玉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深受其所處文化情境的影響，像是阿玉不太敢穿花衣服，因為她怕被鄰居笑說不知羞恥，年紀那麼大了，還那麼花枝招展。

（二）語言環境

阿玉幼年時，台灣還處在日據時代，在訪問阿玉的那段期間，阿玉曾談到幼時的一些玩伴，她說她還記得隔壁住了一戶日本人家，父親是當警察的，家裡有兩個女兒，她常在農忙之餘找她們一起玩跳房子、撿沙包等等的遊戲。我問她怎麼跟她們溝通，她說，都是用日語加台語啊！阿玉甚至還記得那兩個小女孩的日本名，以及自己的日本名字。我問她會不會說日語，她說她現在不太會說了，不過有些還是聽得懂。後來有次我和她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看歌曲點播節目，節目中出現了一首日本歌「岸壁之母」，她就開始跟我解釋歌詞內容，她說，這個故

¹ 指的是春天時，如果清晨有霧，那麼當天就會放晴，夏天時，如果清晨罩霧，則當天下雨的機率就很大。

事是在講一個母親失去孩子，非常的苦悶，常跑到海邊去思念孩子的故事，我要她一句一句翻給我聽，讓我知道故事的內容，她說她知道歌詞的意思，不過不太會說。

從阿玉回憶早年與玩伴相處的情形，我們可以得知，其早期所處的語言環境，可說是個多語充斥的文化情境，除了阿玉的母語閩南語外，當時台灣正處於日據時代，盛行的語言是日本語，甚而未受過正式教育的她，都還略懂日語，知道某些話語的日文發音或使用方式，與閩南語的異同。

而在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普通話及各式大陸方言在整個台灣更是處處可聞，當時阿玉充其量是個還不到二十歲的少女。這些早年多語充斥的文化環境，對於阿玉的語言分析能力，自是有些幫助。像是在日常生活中，阿玉會解釋日語歌詞的中文意義，並分析某些日文和中文用語的差異，而許多閩南語的用字也是源自於日語，像是西米羅(西裝)、孔古力(水泥)等。

關於所處語言情境對形塑文化工具箱的影響，前面我們曾引述 Finnegan(1988: 46-58)的研究談到，在多語環境下成長的人，較具語言使用及結構的分析能力。而 Finnegan(1988)的研究結果，在我進行另一個案研究時，也同樣發覺。

我曾到澎湖縣的離島七美採訪一個文盲，發現兩邊的語言使用有一些差異。雖然七美人也以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但她們的閩南語和台灣有相當大的差異，七美閩南語的語音較偏文言，台灣使用的則較偏白話，有許多字在台灣閩南語中，發的尾音是一，但在七美則是發ㄨ的音。例如，「你」這個字，在七美發做「汝」，「魚」這個字，則發做「浮」。

在七美採訪的那段期間，由於我的閩南語本來就不夠流利，再加上我的發音又和她們不同，我發現這個報導人，會經常和我討論我的閩南語發音，及語言使用的方式，並向我分析這兩種發音系統及使用方式的異同。

(三) 社會環境

1. 經濟活動

另外，阿玉還談起很多日據時期發生在她週遭的事物。根據阿玉的說法，在二次大戰日據時代，整個臺灣社會，因為物資缺乏，而採食物配給政策，每一家依其人口數多寡，只能買到固定配額的食物。當時政策規定，農家必須將所有的稻米上繳，使得食物一時變得洛陽紙貴。許多人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會私藏稻米、食物，到黑市賣「丫迷」(野物，即走私物品)，以換取較高的價錢，或是更好的物資，像是肉類或是香煙。當時，她有個阿舅，因為想要買些東西，就和幾個朋友坐著火車，到松山去賣「丫迷」，後來這個阿舅將賣「丫迷」所得的錢，向戰敗要回家鄉的日本人，買了件五百五十元的「西米羅」(西裝)，穿回村裡，讓大家羨慕了好久。

2. 社會制度

阿玉是在十八歲那年嫁給先生。先生原在阿玉養母家幫忙，因為日久生情的關係，喜歡上阿玉，後來託人到養母家說媒，養母看先生勤奮，不嫌棄他貧窮出身，就將女兒嫁給了他。剛嫁到先生家，阿玉說她很不習慣，先生家雖然也是種田，但因為家窮，阿玉要做的事很多，像是每天四點半起床，煮一大家子的飯，把點心擔到田裡，還要幫忙挑水、曬甘蔗、下田等，阿玉說那時候她常常哭，因為事情做不完，要不是因為先生很體貼，還有當時沒有工廠(她覺得自己可以去當女工，就有經濟能力了)，她早就離家出走了。從阿玉的描述，我們可以得知，阿玉早期是生活在一個大家庭制的社會中。

3. 社會律法

不過還是有一次，因為把吃飯用的大鍋打破，遭婆婆責罵，阿玉一氣之下就決定離家出走。阿玉說，她那時候被婆婆責罵時，跑去找村長仲裁，跟村長說她要離婚。結果村長叫她等一下，他要先去買菜，回來再辦阿玉這件事。過了沒多久，村長就把阿玉養母帶回，養母訓了阿玉一頓後，再帶她回婆家道歉，順便請婆婆多照顧她一點，結果反倒是婆婆覺得自己罵阿玉罵得太難聽了，很不好意思。

思，以後也就對阿玉很好了。

從阿玉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阿玉早年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個人際關係緊密、以大家庭為主要組成方式的社會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即便是經濟交易，都是以物易物，以金易物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進行，地方耆老則為糾紛的主要仲裁者。

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際互動密切頻繁，幾乎人人互識的文化情境中(故而阿玉與婆婆吵架，村長才知道要找養母來調停)，再加上未受過教育、不識文字無法閱讀及獲得生活以外或書本中的知識，故而阿玉主要的資訊取得及溝通管道，以人際傳播為主，而其行為表現，也深受週遭人物及所處情境的影響。像是阿玉很怕別人說閒話，所以不敢穿花衣服，認為媳婦就是要跟公婆一起住，嫁出去女兒就是別人家的等。

(四) 教育情境

雖然沒有受過正式學校教育，不過阿玉還是擁有相當多的技能和知識，只是這些技能和知識，大半都是與日常生活或工作緊密相關，像是煮飯、捆柴、收割技巧等。在訪談時，阿玉就曾告訴我一些生活知能，像是收割稻子時，手要怎麼抓稻草才能抓得順，蕃薯要怎麼栽，收成才會好，芋頭要怎麼看，才會好吃。

至於這些技能怎麼學到的，阿玉常常回答我說，她不知道，事情就是這樣啊。我問她說，是不是有人教她，她說有些事是有人教，有些事就是自己學的啊，不過大部分的事情還是自己學來的。像是有次我問阿玉怎麼學會煮大鍋飯的。阿玉說，剛到先生家，她因為在養母家沒做過粗重的工作，不會煮大鍋飯，所以常被嘲笑軟弱，不過婆婆還是會要求她煮，因為這是做媳婦的責任啊，那時也沒人願意教她，她只得一面做一面學，所以才會打破鍋子，她笑說，剛開始煮的時候，常有些菜煮的不熟或焦掉，大家都會抱怨，不過後來煮久了，就知道怎麼煮了啊。

從上面阿玉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阿玉的知識取得方式，主要是採做中學的方法，甚至是沒有人教，透過嚐試錯誤(trial and error)的過程，慢慢的調整出

一套屬於自己的問題解決方法，而其所取得的知識內容，大半則是與其日常生活中所遭逢的各式問題有密切相關，較少屬於抽象或與其生活無關的知識，整體來說，這樣的知識取得方式及文化情境，使她習慣以所處情境的分類及問題解決方式，思考問題。像是，阿玉習慣以生肖來計算人的年歲，在陰曆每月初一、十五，都會在家門前拜拜等。

總結來說，阿玉所處的早年文化情境(大約是民國三、四十年代的台灣)，主要是個農業社會，大家庭制度盛行，耆老及長輩為事件糾紛的主要仲裁者，少有電子化傳播媒介，主要以口語媒介做為傳播及思維工具，公共交通工具不發達，人們大半只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活動，使用取自自然情境的人工製品，經濟活動採以物易金的面對面人際傳播方式進行，教育不普遍，識字人口不多，知識的取得以實作和師徒傳承為主，是個充滿幾種不同語言的社會。

如果依照前述所談的媒介文化概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阿玉早年所處的文化情境，雖然夾雜著少許文字/電子文化的媒介使用，但整體的生活情境，仍是較偏向於口語文化的情境。

三、目前所處文化情境

(一) 媒介情境

1. 傳播媒介

阿玉和大兒子一家人同住，雖然住在台南縣的鄉下，不過家中幾乎所有的現代電子用品都有，像是電腦、電視、收音機、電話²、手機、洗衣機、冷氣、電鍋等。阿玉雖然不會用電腦，但她知道電腦是用來做什麼的，至於其他的電子媒介，像是電視、電話、收音機等，則是她平常用來獲得資訊、娛樂自己和與人溝通的重要傳播媒介。

² 阿玉有本屬於自己的電話簿，也會打電話給一些親戚，甚至還會打電話跟組頭簽賭。跟阿玉相處的那段時間，偶爾會看到阿玉打電話向組頭簽賭。

由於家人都在上學或工作，所以白天阿玉大半是一個人在家，不過阿玉並不太常感到無聊，因為她會利用手邊的這些傳播媒介，獲取生活資訊並娛樂自己。阿玉有一套固定的媒介生活劇本。早上五點起床，到市場買完菜和菜市場朋友聊完天，回到家吃完早飯，稍做整理後，她會開始打開電視，看八點的民視台語新聞，看看昨天一天台灣發生了些什麼事，還有最新的新聞事件又是什麼。

九點到十點時，她會轉台去看「台藝」電台的某個綜藝節目(天天 24 點)。這個綜藝節目的內容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划酒拳比賽，由衛冕者與挑戰者競賽，裁判在一旁計分，採二十拳計，誰先拿到十一分，誰就獲勝，衛冕者其後再接受挑戰者的挑戰，一直到五連勝後，可得高額獎金；第二部分為歌唱「對嘴」比賽，其形式是由主辦單位播放原歌手的歌唱帶，看參賽者「對嘴」的表現及台風如何，中間所播放的廣告，大部分皆為藥品廣告，像是「流民拳筋骨散」、「安腦丸」、「健兒寶」等等的。

十點到十一點，她會打開她的收音機，聽台南某廣播電台的台語新聞評論節目。這個節目的內容，是由主持人針對目前台灣發生的各式時事，進行分析和評論。在節目進行中，主持人會佐以大量新聞報導所提供的資訊和資料，進行分析和說明，以支持其提出的論點。節目的供應商是個藥商，阿玉曾經談起，她覺得節目主持人對於時事評論的觀點很好，講得很有道理。我問她是不是買過節目廣告的藥，效果如何，阿玉說，這些藥的藥效很好，不過太貴了，她買不起，倒是朋友曾經託她購買藥品治酸痛，效果非常的好。

十一點過後，阿玉會開始準備煮午餐。阿玉說她有個怪僻，就是她買的菜不喜歡讓別人煮，所以即使跟媳婦一起住，家中的食物，主要還是由阿玉準備。在訪問阿玉的那段期間，由於孫子孫女都在上課，所以中午時，只有我和阿玉及媳婦一起吃飯，我們常在一起一面做飯、吃飯一面聊天。

吃完午餐後，阿玉通常會看看電視。阿玉看的電視還是以閩南語節目為主，她說雖然聽得懂一些國語，但是她看得很吃力，她還是比較習慣收看民視、三立電視台的戲劇或綜藝節目，偶爾也會收看一下閩南語新聞。阿玉如果看的是歌唱

綜藝節目，她會打電話到電視台去點歌，最常點的歌是「等無人」，她並且告訴我電話很難打，她打過幾次，都打不進去，在打電話的同時，她甚至會進一步指導我說，如果打通了要開始唱，妳要把電話話筒拿相反，這樣聲音才會出來。

看完電視稍做休息，阿玉會去睡午覺，睡到兩、三點，午覺醒來後，看個電視再到附近和朋友聊天，接近傍晚時，再回家等孫子孫女放學歸來。晚上主要以觀看八點檔戲劇與綜藝節目，及與家人聊天為消遣。

我曾在阿玉家住過三段時間，有段時間台灣正值選舉熱，那時阿玉對於選情相當關心，所以每天晚上都會準時觀看由汪笨湖主持的政論性節目-「台灣心聲」，聽聽汪笨湖及其他各黨的來賓對於台灣政治局勢的分析。在這個節目中，汪笨湖會邀請不同立場的節目來賓(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或資深媒體工作人員)，針對台灣目前的政治現象與選舉議題，進行分析、意見發表及探討。在節目進行中，許多來賓會引用大量的民調數據或政治新聞，以支持自己的論點，而節目來賓所談論的內容和論點，及評論和分析時事的方式，就成了阿玉與其他人討論及說明自己政治論點的重要資訊來源。

這個固定的媒介生活劇本在阿玉到大陸後，仍舊被套用。阿玉的老公在大陸東莞經商，前一陣子接阿玉到大陸旅遊。由於大陸東莞也有播送台灣的有線電視節目，所以阿玉在住過一段時間後，就自己摸索出相對應的電視頻道出來，像在採訪她時，她就自己說道，她在大陸也有看台藝的這個綜藝節目，不過這個節目在台灣是 19 台，在大陸是 23 台。

在此，我們將阿玉目前的電子媒介使用行為稍做整理，可得出下表：

電子媒介	節目名稱	節目類型	節目內容	廣告內容
電視	民視台語新聞	新聞報導	新聞事件相關資訊內容,及記者與主播對於新聞的詮釋與播報	以國語發音為主的各項日用品
	台藝綜藝 -天天 24 點	綜藝節目	划酒拳及歌唱對嘴比賽,賽後裁判除了會打出分數外,也會對參賽者的表現提出評語	以閩南語發音為主的藥品廣告
	八點檔戲劇節目 -長男的媳婦、霹靂火、不了情、又見阿郎、台灣龍捲風等	戲劇節目	具戲劇性的日常生活故事	以國語發音為主的各項日用品
	年代-台灣心聲	時事評論	時事資訊、主持人及來賓對於事件提出分析評論及看法（偏民進黨）	以國語發音為主的各項日用品
廣播		時事評論	時事資訊、主持人對於事件提出分析評論及看法	以閩南語發音為主的藥品廣告

表 4-1：阿玉電子媒介使用狀況表

由上面阿玉的電子媒介使用狀況，我們可以發現，在阿玉目前的日常生活中，電子媒介的使用佔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不論在台灣或大陸，她每天接觸電子媒介的時間，幾乎都在八小時以上，除非有突發狀況，例如晚上家人一起出門吃飯，

或參加進香團到各地寺廟參拜，否則大半日子裡，阿玉的生活會照著她那套既定的媒介生活劇本運行。

從阿玉的電子媒介使用狀況，我們可以看出，其觀看及收聽的內容，主要以閩南語的電視或廣播節目為主，但在觀賞的節目類型部分，就較為多元，包含了新聞、戲劇、綜藝，甚至是政論性節目。

在新聞節目部分，阿玉最常觀看的是民視台語新聞，通常觀看的時間在早上八點到九點及晚上六點到七點，之所以選擇台語新聞，主要是因為語言使用及理解上的問題，阿玉不太習慣其他電視台國語新聞的播報方式，雖然阿玉其實聽得懂國語，但是對她來說，在理解上會較吃力，故而她還是選擇收看台語新聞。

在戲劇性節目部分，阿玉所觀看的節目，也是以閩南語發音為主，主要是些鄉土連續劇，內容大半不脫男女情愛、婆媳問題、商場競爭、妯娌等問題，與阿玉早年及目前生活情境，有某種相呼應的關係，故而在觀看節目時，阿玉常產生心有戚戚焉的感覺，並不時在觀看電視時，會加些自己的評語。而這些評語主要是取自阿玉所處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像是阿玉所處的文化要求女性要對先生忠貞，故而對於電視中所呈現的水性楊花女性，阿玉會給予相當嚴厲的譴責，說她們不會有好下場。

在綜藝節目部分，阿玉主要觀看一些歌唱比賽的節目，不過比賽參賽者，通常年齡較大，且不太需要太高的專業技能，像是阿玉所觀看的划酒拳及歌唱「對嘴」比賽，相較於一般歌唱比賽所強調的音質、聲音技巧、節奏、表現方式等評分標準，所需的專業技能顯然低得多了；在政論性節目部分，由於政治傾向再加上語言使用的影響，阿玉所收看和收聽的新聞或政論性節目，在政治訊息的提供部分，通常較支持民進黨。

另外，從阿玉的媒介使用情況，我們亦可發現另一個特點，即台語藥品廣告的充斥。在採訪阿玉的那段時間，我發現生活在她週遭的那些老人，大半都有收聽台語廣播節目的習慣，由於這些廣播節目的廣告，大半都是販賣一些與老人病痛相關的藥品，像是吃預防中風、明目、顧筋骨的藥，加上這些老人本身也擔心

自己的病痛，且對於主持人所宣傳的藥效極為相信，故而有許多老人會受廣告內容的影響，而跑去購買，像是阿玉就說，住在隔壁的大嬸，就曾經買了吃不會斷腦筋(中風)的藥，效果還不錯。

整體來說，阿玉所觀賞或收聽的節目，甚而是廣告，大半是些與生活內容習習相關，且較不需耗費腦力或專業知識的節目，這些節目內容共同的特色是，節目內容或遊戲規則及流程相當簡單易懂，像是她所觀看的綜藝節目，參賽者就不需要具有太高的專業技能，即可參加比賽，而即便是廣告，或是較講求專業知識的政論性節目，所談的內容，也與阿玉日常生活所關心的事物息息相關，或與其政黨傾向互相契合。

雖然相較於其他知識性、益智性的節目來說，阿玉觀賞的這些節目內容和流程較為簡單易懂，不需要耗費太多的心力，不過這些節目，仍是適時的提供了阿玉相當多的日常及抽象知識內容，及各式的分析、評論、邏輯思考等文字文化的工具箱。

像是民視的台語新聞及氣象報導，就提供了許多阿玉生活以外的抽象資訊，讓阿玉知道，我們的天氣是以溫度來測量，度數越高表示天氣越熱；而「台灣心聲」的時事分析與評論，則提供了阿玉一些政治知識，及分析、評論、邏輯推理等思考工具。像是透過台灣心聲的觀看，阿玉知道一些有關槍枝射擊時，所可能造成的後果，及政黨政治在運作時，兩黨各自使用了那些宣傳招式等。

由於阿玉幾乎整天都曝露在電子媒介下，大量的接觸節目中的各式訊息及口語表達方式，久而久之，在長期浸淫及觀察學習的狀況下，這個文字/電子文化的情境，對於阿玉的口語表達行為及文化工具箱的使用，自是會產生影響。像是阿玉偶爾會學政論節目的主持人，利用節目中獲取的政治知識，評論起政治人物的一些作為，像她就對於朱高正的言論相當不滿，認為他是個西瓜偎大邊的人。

當然，除了大眾媒介工具的使用外，阿玉仍是處於一個相對上人際互動較為密切的文化情境中，例如阿玉幾乎下午每天都會抽個時間，到朋友家中和人聊

天，有時談談週遭的人事物，偶爾發表自己對於政治時事的看法。而這些親友的價值觀及看法，對於阿玉的行爲，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像是阿玉會因爲怕被鄰人笑，而不敢在外面翻看報紙。

從阿玉的傳播媒介使用情形及所處的環境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電子/文字文化中所充斥的各項訊息，及節目內容中所提供的氣象、政黨宣傳運作等抽象知識、新聞評論節目所提供的分析、評論和邏輯推理方式，可能對於阿玉的口語表達行爲造成一些影響外，對於阿玉來說，人際傳播的互動方式，及生活週遭人物的看法，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性。

2.交通工具

阿玉是我訪問的第一個個案，今年七十二歲，住在台南縣柳營鄉。柳營算是台南縣一個較小的鄉鎮，雖然台灣交通相當便捷，但鄉中大半的人，由於公共運輸不發達，所以如要出遠門，通常還是以自行開車爲主。阿玉曾經談到，她年輕時偶爾還會搭公車到台南市區，不過現在因爲子女有車的關係，再加上搭公車非常費時，所以如果要出遠門，像是要到成大看病，通常就是請子女開車送她去。

至於在住家附近的活動，由於不會開車和騎車，所以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兩條腿或腳踏車。阿玉以前常騎著腳踏車到處找鄰居聊天，不過前一陣子因爲摔車受傷，家人不允許她再，所以阿玉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兩條腿。

雖然阿玉主要活動範圍在住家附近，不過她也經常有遠遊的機會，像是村裡的那座大廟，常會組成進香團，邀村裡的老人一起到台灣各地的廟宇拜拜兼遊玩，每個人只要繳個三、五百塊，就可以有早、午、晚餐可吃；另外，由於阿玉老公這幾年在大陸經商，所以她偶爾也會到大陸遊玩，不過阿玉每次去大陸玩，都要有家人陪著，因爲她自己一個人不會搭飛機，也不知道路怎麼走。

3.物質工具

阿玉家中有許多現代電器用品，像是洗衣機、電鍋、冷氣、電冰箱等，由於家人在早上大多出門上班，所以家事大半都由阿玉親手做，像是洗衣服、煮飯等。

雖然許多電器用品，透過販賣商人和家人的教授，阿玉也會簡單的按鍵操作，不過阿玉並不太了解這些機器的運作原理，所以通常只要電器一不運轉了，阿玉就沒輒。像是有次阿玉想將冷氣機的濾網拿下來洗，但是她並不知道該從哪裡抽取出濾網，只得等工人到家裡來幫她做這件事。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阿玉所處的媒介環境，是個充斥電子傳播工具、交通工具及電器用品的媒介環境。阿玉透過這些電子媒介獲知訊息、消遣娛樂及與人溝通，並透過各式交通工具的搭乘，到台灣各地旅遊，甚而遠赴大陸探親，也利用各式電器用品，來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各式困難，像是用洗衣機洗衣服，用電鍋煮飯等。整體來說，阿玉所知道的世界，較過往來得大的多，活動的範圍也比以前遠的多，而生活中的各式事物也較以前來得還要便利。

而這樣的文化情境，也提供了阿玉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像是透過電子媒介節目中，新聞時事評論主持人及來賓口語表達方式的觀察，及到處旅遊的經歷，阿玉取得了一些抽象知識與普同事物的分類架構。像是阿玉知道果汁、可樂和汽水，可通稱為飲料；知道桌子、椅子、床等，叫做家具。另外，透過電子媒介節目內容的學習觀察，阿玉也學會了文字/電子文化中分析及評論事物的方式，像是阿玉會利用在電視節目中取所得的政治資訊，分析台灣這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但也由於與週遭親友的互動關係密切，在思考事情時，阿玉仍會受到所處情境中的社會規範所影響。

（二）教育情境

阿玉曾經談到，她們柳營鄉有好幾所學校，政府非常鼓勵老人繼續進修，曾經透過里長寄發入學通知單給鄉內不識字的老人。確實也有許多老人因此而前往鄉內小學就讀。我問阿玉為什麼不去唸書，阿玉說她對讀書沒興趣，她不喜歡讀書，要不然以前養母要她去讀時，她就去了。

在採訪的這段期間，我會試著幫阿玉做一些事，像是幫忙洗衣服或煮菜。大

概是沾染了文字文化的思維習慣，我對於事物操作的步驟及精確數量大小，非常的執著，常常會要求阿玉講一個具體的數字，讓我能依樣遵循。像是在和阿玉學習煮菜時，我會要她告訴我，火要開多大、鹽要放多少匙、菜要煮多久時間，通常阿玉都不會告訴我像是一湯匙、三分鐘的精確數字，她最常說的話語是「量其大約」，她的這個說法，開始的時候，讓我非常的困擾，因為我不知道「量其大約」究竟是要放多少鹽或煮多久。不過後來經過幾次的實作之後，我自己也開始知道，這是很難去說的，因為隨著情境的不同(像是菜量的大小，衣服的多寡)，必須要做不同的調整，要怎麼拿捏數量的大小，不是那麼簡單的。

另外因為經常買菜，不時需要算錢，所以阿玉的數學計算能力還算不錯，在訪談阿玉的那段時間，我發現她的計算方式，非常類似現在的建構式學習法，即用以已知的東西，去推未知的東西，如果用在數學運算上，就是以加法為基礎，去做乘除運算。像是有次她買了八斤柳丁，她在口裡喃喃的算說，一斤十七塊，十斤一百七，再減兩斤三十四塊，所以是..，一百三十六塊。

而這種建構式學習法，阿玉也運用在頻道的命名上。前面說道，阿玉經常看的節目以閩南語頻道為主，像是台藝、三立和民視等頻道。有次我問阿玉她都看什麼電台，結果她回答我，她最常看的是 19 和 29 台，那時因為很少看電視，我就問她，這是什麼頻道，結果她回答我，就是 19 台啊。後來我才發現她不太知道我們一般對於電台的命名，像是 TVBS、三立等，她只會用數字來為這些頻道命名，而她之所以用數字稱呼頻道，主要是因為電視上所顯現的頻道號碼是她唯一知道的可以辨視的記號，而她只能以這個已知的東西，去推未知的頻道名稱，故而她就以數字代號來稱呼這些電台。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阿玉雖然身處在一個正式教育機構林立的环境中，但阿玉目前主要知識的取得方式，仍是採做中學的方式進行，即從實際實作的過程，學習問題解決的方法，且其獲取的知識內容，主要仍是與其日常生活有密切關連的實用知識。

當然，阿玉有些思考及分類方式，也不盡然與台灣傳統的分類方式完全相同，因為透過電子媒介的接觸及四處出國旅遊的影響，阿玉也具有某些抽象的知識和概念，像是阿玉知道果汁、可樂和汽水，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質，可通稱為「飲料」；知道桌子、椅子、床等，叫做「家具」，也知道西元的算法及出國旅行時要換錢幣，只不過在思考所面臨的大半問題時，阿玉仍是較依其所處情境的價值，去做思考。

(三) 社會情境

1. 社會制度

阿玉現在住的房子是透天的三層樓，據阿玉的說法，他們當初是以農舍的名義申請興建的，由於當時「分食」（分家）時，大伯分到隔壁的地，故而在建房時，就和大伯商議，一起興建房舍。現在大伯就住在他們隔壁，彼此之間經常照應。

目前阿玉和大媳婦和兩個孫女住在一起，每天早上起床後，阿玉就會到鄉內的菜市場買菜，和市場內的小販聊天。阿玉和菜販的關係非常像是朋友，有次我陪阿玉到市場買菜，阿玉買了幾顆的蕃茄，我問阿玉，家裡明明已經有一大袋蕃茄了，為什麼還買蕃茄呢？阿玉說，那個賣蕃茄的是她的朋友，她們常會一起出去玩，她不好意思不「光顧」他的店，所以就買了兩三顆意思意思。

2. 規範方式

阿玉和週遭朋友的互動很密切，常常會到附近朋友家中聊天，有時也帶我去。由於村中人的互動很密切，所以阿玉說她很怕人家說閒話，像有次我問她，為什麼不叫做裁縫師幫她把衣服做的美些，阿玉說，她是老人，老人要認老，穿要穿像她們的年歲。像她們那種年紀，穿得太艷，她們草地人(鄉下人)會笑，說妳是賺吃女人(妓女)。因為草地人是這種觀念，草地人很會笑人。

雖然阿玉很在乎村人的想法，但是並不表示阿玉不知道或不遵照文字/電子

文化中白紙黑字的規範方式，因為有時這些規範還是與生活密切相關。例如因為這幾個月台灣南部下雨不豐，阿玉就知道政府在鼓勵人民休耕，只要休耕就可以取得多少錢。只是阿玉對於這些規範方式的知識取得，通常是透過地方的村長，或是家中的男性而得，而且對於規範的細節內容，她也並不是真的那麼清楚。

3.經濟活動

根據阿玉的說法，先生每個月給阿玉大約三萬元，主要是付水電瓦斯及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阿玉不會到郵局、便利商電繳錢，通常都是媳婦告訴阿玉，這個月的水電瓦斯多少，然後阿玉再把錢拿給媳婦到郵局去繳。另外，阿玉平常不太花大錢買東西，先生給的生活費，繳完水電費及一些紅白帖之後，剩下的錢，主要都是買一些「傳家貨」（日常消耗品，像是衛生紙、鹽、醬油）。至於對於現在流行使用的信用卡，阿玉雖然隱約知道那是什麼，不過她說她只有聽過，沒有用過，也沒拿過金融卡去提錢，因為她不會操作那台機器。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阿玉目前所處的環境，是個人際互動密切，以金易物的交易環境及以大家庭為主的社會環境，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故而阿玉的認同也來自於整個社群，在這個社群中，阿玉將自己定位是個老人，而在選擇如何穿著時及思考各式問題時，阿玉也傾向以「所處社群情境」的思維方式去做思考，會顧及自己的老人身份和村人的想法，選擇穿著比較樸素的服裝，以免引人非議。

（四）語言環境

阿玉聽得懂一些國語、日語，偶爾談話中會夾雜一些國、日語，並會做些簡單的語言分析，像是她會跟我說她的日語名字叫什麼，中文是什麼意思。另外，阿玉也知道有客家、原住民等語言，但是她不會說，也聽不懂這些客家、原住民語。她日常生活主要的溝通語言就是閩南語。至於其他國家的語言，像是英語，

因為經常看電視，阿玉也知道這些語言的存在，甚至可以做到基本的辨視，但對於其中的語言使用與發音異同，她則是一無所知。

總結來說，阿玉目前所處的文化環境，是個人際互動密切，社群的規範力量強大、大家庭制度盛行，電子傳播媒介充斥的環境。在此環境中，人們的溝通除了使用口語傳播工具外，電話、手機等電子傳播工具也很發達，公共交通工具充斥，人們的活動範圍增大，家家戶戶充斥著各種解決日常問題的電子用品，但經濟活動仍採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教育機構雖普遍，但知識的取得仍是以實作和師徒傳承為主，是個充滿多種不同語言的社會。

如果依照前述所談的媒介文化偏向概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文化情境和教育情境部分，上述所說的人際互動密切，社群的規範力量強大、大家庭制度盛行、實作與做中學的學習方式等特質，似乎較符合口語文化的情境；但在媒介及語言情境部分，阿玉生活在一個充滿各式電子傳播媒介的環境中，而公共交通工具的發達，也使得人們的活動範圍增大，另外，家家戶戶充斥著各種解決日常問題的電子用品、多語並存等狀況，似乎又較偏向於電子/文字文化的情境。換言之，阿玉目前所處的日常生活情境，可以說是一個口語文化及電子/文字文化的混合體。

而也由於身處於這樣一個混血的文化情境中，阿玉因而也擁有不同於早期口語文化所形塑的文化工具箱。像是在媒介情境的部分，由於經常性的觀看及收聽電子媒介中的新聞、評論節目，再加上旅遊經歷的豐富，透過對於新聞時事資訊的收集，及到處旅遊的經歷，阿玉取得了一些抽象知識與普同事物的分類架構，像是飲料、家具、氣象等概念，而形成某種程度的「抽象思維能力」。

而透過對於評論節目主持人和來賓評論時事方式的觀察與學習，阿玉在某些時候，也會以「分析」及「三段式邏輯推理」方式，進行評論；再加上各式人造物及電子記憶工具的盛行，使得阿玉也習慣以「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來解決問題。像是阿玉會使用錄音機來錄製她想聽的歌曲，經由重覆的播放，來學習新歌，

只不過對她而言，按鍵功能的使用，是透過位置的記憶而來，她並不真正了解這些按鍵所代表的意義及其運作的原理，所以有時候錄音機壞了，她就不知該如何處理。

當然，目前阿玉仍是處於一個相對上人際互動較為密切的文化情境中，例如阿玉幾乎下午每天固定都會抽個時間，到朋友家中和人聊天，有時談談週遭的人事物，偶爾發表自己對於政治時事的看法。而這些親友的價值觀及看法，對於阿玉的行為，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像是阿玉會因為怕被人笑，而不敢穿太美的衣服。故而所處文化的衣著價值觀，對於阿玉仍具有重大的影響。

第二節 阿玉具有的媒介文化工具箱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行為，會受其早年及目前所處媒介文化情境的影響。而如果我們將上述阿玉早年及目前所處文化情境所做的探討做一結合，就會發現，影響阿玉口語表達行為的文化情境，除了前述所提到，早期所處的口語媒介文化外，還包括了目前所處的口語文化及文字/電子文化的混合體。

在早期媒介文化情境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到，阿玉所處的早期媒介文化，主要是個農業社會，大家庭制度盛行，耆老及長輩為事件糾紛的主要仲裁者，少有電子傳播媒介，主要以口語媒介做為傳播及思維工具，公共交通工具不發達，人們大半只在自己住處附近活動，使用取自自然情境的人工製品，經濟活動採面對面人際傳播方式進行，教育不普遍，識字人口不多，知識的取得以實作和師徒傳承為主，是個充滿幾種不同語言的社會。

而身處在這樣一個大家庭制、人際互動頻繁的環境中，週遭親友的看法就成了阿玉一個行為表現的重要依據，再加上大半的知識都必須透過實際生活做中學的方式取得，沒有什麼抽象的知識來源，故而阿玉很習慣以其所處情境的「文化價值觀」在思考事情。而由於知識的取得是採做中學的方式進行，其學習或理解意義的過程，主要是透過人事物同理和認同過程而來，故而在故事敘述時，阿玉也很容易「角色扮演」的方式進行。另外，在口語文化的情境中，由於口語為主

要傳播及思維工具，缺乏一些輔助記憶的工具，爲了讓自己的思考便於運作及傳遞，阿玉也發展出一些解決之道，而以俗語、諺語等「套語工具」進行問題解決。

當然，阿玉早期所處的文化情境，也不見得只會形塑口語文化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多種不同的語言共存的情境，及對於不同語言(日語和台語)的理解與實踐使用，與不斷的進行語言翻譯的過程，也很可能使得阿玉某個程度具有語言後設「分析能力」。

而在目前所處文化情境部分，阿玉可說是處在一個口語文化及電子/文字文化的混合體中。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除了可能擁有先前早期所處口語文化所形塑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及「角色扮演工具」等文化工具箱外，透過各式電子媒介節目的觀看和收聽，阿玉也取得一些飲料、家具等抽象概念及分類架構，而擁有某種程度的「抽象思考能力」；另外也由於經常性的觀看及收聽各式新聞及評論節目，透過觀察學習電子/文化中人，分析和評論時事的論述方式，也形成阿玉「分析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文化工具箱。再加上各式人造物及電子記憶工具的盛行，使得阿玉也習慣以一種「資訊搜尋與記錄」的方式解決問題。

換言之，在進行口語表達或故事敘事時，阿玉不只可能會使用早期口語文化所形塑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等文化工具箱，也很可能會使用，由文字/電子文化電視新聞及評論節目中，所形塑的「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及「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第三節 阿玉媒介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

前面文獻中我們曾經談到，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問題及達成其意圖。

而在上述有關媒介文化環境及文化工具箱說明中，我們也發現，透過口語文化及文化/電子混血媒介文化環境的形塑，阿玉在口語表達及故事敘事時，不但

具有口語文化情境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和「角色扮演工具」等文化工具箱，同時透過在目前所處媒介文化中，長期對於新聞、時事評論節目的收看與收聽，阿玉也具有文字/電子媒介所慣用的「分析式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及「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等文化工具箱。

那麼，在日常生活口語表達行為面臨各式問題時，阿玉又是如何使用這些媒介文化工具箱來達成意圖與解決問題？

前面談到，本文將文化工具箱，視為一種人們用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或達成意圖的工具。故而，如要說明阿玉的口語表達，我們必須先從阿玉在表達時欲達成的意圖著手。

根據陳滿銘(1994)、王鼎鈞(2003)等人的說法，在寫作文章時，不同的文體可達成不同的目的和意圖。例如，議論文可達成說理和說服的目的，抒情文則具有抒發情感的作用。在此，雖然文章寫作是以文字表達，但由胡適先生所提倡的「我手寫我口」運動，我們亦可得知，文字書寫，是與口語表達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故而關於表達行為的意圖說明，或許我們可從文體的分類著手。

根據一般寫作原則，通常我們會把寫作文體分為論說文、記敘文、抒情文及應用文等四類，而論說文又可再分為議論文，說明文(陳滿銘，1994；王鼎鈞，2003)。不過這種分類方式，主要用於文字寫作上，有些文體，在一般口語表達時，並不會使用，例如，強調特定書寫格式的應用文體(像是書寫、公文)；另外，在田野觀察時，我發現阿玉不太使用抒情文體，也很少談到自己的感覺和感受，故而在此，我主要從議論、說明和故事敘述三部分，來說明阿玉在口語表達時，選用了哪些文化工具箱，及其如何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來達成意圖。

不過在說明阿玉的媒介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前，有個重要的觀念在此要做一說明，在文學界中，口傳文學是否可被歸類為文學藝術創作，一直是個爭議問題。其爭議因素，主要與口傳文學屬眾人創作、無法追溯作者、不易保存及結構較為鬆散等特色有關。在《口語性和文字性》一書中，Finnegan(1988：124)曾談到，許多口傳文學後來之所以能被學術圈接受，成為可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因被轉譯

成「紙本」、「文本」，成了一個客觀可被分析和比對的客體，才使其文學藝術性獲得承認。

但這種去情境，只集中在文本分析的方式，並無法完全了解口語表達構成及文化工具箱使用的過程。事實上，還有許多其他需要被同時考慮的情境因素，會影響著我們的口語表達。而這些因素是我們在從事口語表達研究時，必須加以考量的。例如：聽眾的反應、表達時的文化情境、當時的對話脈絡等。

對於這種話語文本化的分析方式，Finnegan 曾提出強烈批評。Finnegan(1988：124)認為，這種文本化作法，將我們的研究對象(口語表達)，從它表演的行動和情境移開，將使得口傳文學的藝術性完全扭曲消失。因為這些表演元素，在口語演出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表演的風格(節奏、情緒、動態或語調等)，由表演者所傳達的人物性格和戲劇性，透過聽觀眾對於表演者的驚嘆、回應和口語反應所產生的回饋，所有的這些，都不只是文字書寫下的裝飾意義，而是言說行動中的重要構成物。

針對這種缺乏與忽視，人類學者 Bauman(1977)、Finnegan(1988)曾提出「表演中心」(performance-centred)觀點，強調研究者應將所有的口語表達，視為是某個既定時空下的傳播事件，而不只是文字空間定義下的文本。因為單就文本所做的去情境分析，並無法充分表現口語的藝術性，及完全了解表演內容，研究者仍須進一步根基於其歷史文化情境，同時研究說和聽之間的互動過程。

在此，為了避免陷入文本化分析的陷阱，故而在阿玉的口語表達行為說明時，我除了會呈現她的口語反應及話語內容外，還會針對當時對話的情境、聽眾的反應及所處的情境脈絡，做一說明。

一、議論

阿玉不論在日常生活與人交談，或是觀看電視節目，經常會對週遭的人事物或是節目的內容，做出一些評論及提出個人看法，像是看電視時，她會對電視新聞所報導的時事內容，提出一些個人的評論和看法，在日常生活與友人談

話時，她也會針對熟悉的人事物或是新聞中所看到的時事，政治人物的作為，提出一些評語。

在觀察她的評論表達行為時，我發現阿玉會從上述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及「三段式邏輯推理」等的文化工具箱中，抽取出「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等媒介文化工具箱，來達成表達自己看法及評論他人行為的目的。當然，這些文化工具箱的使用階層與頻次各不相同。

一般來說，阿玉在評論事情和發表個人看法時，較常使用「套語工具」的俗諺語和「文化價值觀」的所屬文化價值觀，像是在評論事情或發表看法時，她會大量且巧妙的引用一些台灣的俗諺語和俚語。不過阿玉偶爾也會做一些事物內涵組成元素的分析，像是她會從某些角度，分析一些政治人物的作為。只不過相較於一般文字人來說，她的分析深度及使用的工具箱階層都較為粗略。

以下是，我就其在評論各式時事及提出個人看法時，所觀察到的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舉例說明。

（一）套語工具

由於台灣早年的生活情境，是個少人識字、輔助記憶工具缺少的口語文化環境，故而發展出相當多的套語工具，像是俗語、諺語，在台灣民間就被大量使用和流傳。而也由於從小就身處在這樣一個充滿俗語、諺語的口語文化情境中，故而阿玉在說話時，很習慣會夾雜一些俚語、俗諺或典故。

不過這些俗諺和典故，阿玉並不曉得從何而來，她只是照著以前人的說法，跟著繼續說，也在恰當的時機中，脫口而出。像有次阿玉拿著放在桌上的報紙向我說，她在外面不敢看報紙，我問她為什麼，她回說：

因為在外面看報紙如果認識的人會說，啊，不見笑(不要臉)，沒讀書還在看報紙，那不是萬寶啊拿倒頭(顛倒)

我問她，「什麼叫做萬寶拿倒頭（顛倒）」。阿玉告訴我，那是古早話，意思是不會做的事不要硬裝做會，這樣會出洋相的。我又問她為什麼叫萬寶，阿玉不知道我在問什麼，沒回答我，她的媳婦則在旁幫忙補充說，那是一個人的名字，她們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阿玉媳婦的這個回答，與 Finnegan(1988：69)所說，口傳文學為共同創作，內容經常變動，故而不太能得知創作出處等特色有關。因為在口語文化中，大半諺語的使用，純然是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說法，使用者雖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它，但卻往往不知其出處為何。

在日常生活與人交談時，我發現阿玉時常使用俗諺語，議論某些人的行為，或是提出一些她個人的看法。像是，有次她和朋友聊到昨天電視 call-in 節目講的對談人，他的朋友告訴她，這些政治人物上節目，製作單位都會提供車馬費給他們。當時因為他們正談論到某個她很討厭的政治人物，所以她就下了句評語：

「沒彩錢(可惜那些錢了)，請鬼拿藥單，沒彩那些錢，害人啊！每次講都講那些沒路用的話。」

我問她「請鬼拿藥單」是什麼意思，她解釋說：「請鬼拿藥單，就是說這帖藥仔吃下去就穩死的啊，所以沒彩工(白費功夫)去買藥」。她的意思是在批評這些電視節目，請那個政治人物上節目根本是浪費時間浪費錢。

因為受到先生政治思想的影響，阿玉本身較傾向支持泛綠陣營，採訪她時，有段時間台灣總統選舉正熱，有次她和一些立場不同的朋友聚在一起，當時由於連宋的民調支持度一直居於領先的地位，所以那位泛藍支持者當著阿玉的面告訴她說，「溪水輪流來輪流去，這遍(次)絕對連戰贏，國民黨贏，百分之百啦！」，她當時也跟對方下了句評語：

「孔子公不敢收人家的過夜帖，未到的事情不知，不可硬斷」。

後來選舉結果出來，連宋落敗，她還特別跑去向當初說國民黨穩贏的那個朋友說，我不是跟你說：「連孔子公都不敢收人家的過夜帖，未到的事情不知，不可硬斷」，用來訓誡他，說話要保守一點。

阿玉偶爾使用諺語來訓誡及表達她的意見。像是有次，阿玉的兩個孫女在吵架，阿玉也把她們叫到面前，大聲斥責她們，並告誡她們要「忍氣求財，結氣相殺，不讓人就有代誌(事情)，我們讓人就沒代誌」，要兩個孫女不要為了一些小事就傷了和氣。

在此，如果我們進一步去分析上述這些俚語、俗諺，就會發現，阿玉所使用的這些話語，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即它們通常都使用了「對仗」、「押韻」，甚至是「重複」、「頂真」等修辭工具，而這些工具，即是來自於我們先前所談到的「套語工具」工具箱。

以先前阿玉用來訓誡孫女們的話語，「忍氣求財，結氣相殺，不讓人就有代誌，讓人就沒代誌」為例，如果我們以羅馬拼音呈現的話，就會發現：

lim kui giu zai , gi kui sio tai

「忍氣求財，結氣相殺」這句諺語，不只是在文字上有對仗，且如果從閩南語的發音來看，「財」和「殺」都是押「ai」的韻。換言之，這段話語不只在文字上對仗工整，且在韻律節奏上，也使用了「押韻」這個協助記憶的思考工具。至於其後阿玉自編的「不讓人就有代誌，我們讓人就沒代誌」這句話語，則是透過不斷的重複「讓人」、「代誌」，及再度使用「對仗」、「押韻」的方式，讓語言使用者和接受者，對於話語的記憶更加深刻。

(二) 文化價值觀

前面談到，阿玉經常以俗諺語來評論他人的作為，而如果我們進一步去分析這些俗諺語的內涵的話，就會發現，這些俗諺裡，傳達了相當多所處文化情境的

價值觀。像是阿玉對兩個孫女說的「忍氣求財，結氣相殺」的話語，就相當程度的反應了中國人常說的「和氣生財」觀念。

另外，在針對一些政治人物所做的分析評論中，阿玉也很習慣的會引起一些台灣特有的文化價值觀或習俗，做為分析評論的依據。像是這次的總統大選，她對於宋楚瑜幾次趴跪的行爲特別感冒，故而提出了她個人的一些看法。她說：

「我們人是不能隨便亂下跪的，尤其是古早人說，長輩跪晚輩是不行的，如果長輩要跪我們，我們要跑，我們不要被跪到，我們若被跪到，有時候我們會破病(生病)，我們會較壞，這步跪的喔，很破格。查甫人那款出頭怎麼搞得出來，破格呢！怎麼會有一個查甫人氣慨啦！純粹是為選票啦！」

在此，我們看到阿玉以台灣早期的文化習俗，「長輩不能跪晚輩，否則將為晚輩帶來災難」，及「男兒膝下有黃金」等台灣文化情境特有的知識與價值觀，來分析和評論宋楚瑜的幾次下跪行爲，她認為，宋楚瑜下跪的這項作為，是種破格、傷害晚輩的行爲，沒有一點男子氣概，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贏取選票的考量。而阿玉這些論點的知識來源，即是台灣民間特有的一些情境知識。

（三）分析式思考

前面談到，阿玉除了經常性的收看些娛樂節目，也會收看及收聽一些新聞和政治評論節目。像是在台灣總統大選選戰期間，她會固定收看由汪笨湖所主持的「台灣心聲」政論節目，而透過廣播、電視新聞評論、戲劇節目的收聽，阿玉對於政治事件的知識也越來越豐富，對於政治人物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經常在與其他人聚會時，她會跟著評論起政治局勢或政治人物的表現。而也透過長期的收聽與收看主持人與來賓的言談風格，阿玉在分析和評論起時事時，某個程度展現了文字人的分析思考風格。

像有次我跟著阿玉到她朋友家去聊天，當時阿玉和其他人談論的話題，是台灣的政治人物的表現。在談話過程中，阿玉就提出了她對朱高正的看法。她說：

「朱高正現在都在大陸，他是西瓜偎大邊，哪邊若贏就都講那邊的話。所以現在才會去替國民黨說話，那真是正港的壞人啊，朱高正每黨都有偎到，每黨都被他害到」。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觀看新聞與評論節目，阿玉得到許多關於目前台灣政治局勢及朱高正先前參加政黨活動的知識，而也利用這些知識，阿玉進一步分析朱高正的政治性格為「西瓜偎大邊」，看到哪黨較佔優勢，就倚到那黨去。

阿玉認為，因為現在「民調」顯示國民黨擁有較高支持度，所以朱高正才會轉向替國民黨發言。雖然她的論點不像電視政治評論家講的那麼深入，會使用許多抽象的政治概念和專有名詞，但事實上從她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看見，她利用先前有關朱高正參加民進黨、社民黨所造成影響，及當時台灣有關總統選舉所得民調結果的政治知識，在為朱高正的發言行為做分析評論。

而對於國民黨所舉辦 313 嗆聲活動的成功，她也覺得，那是國民黨跟連戰花了不少錢才搞起來的，不是人民自發的行為，她說：

「那我朋友有去在說啦，去的人給兩千塊啦，另外，遊覽車啦，遊覽車不用錢，像你做司機，我一台遊覽車來到台北，多少錢，你不用給我錢嗎，不然說人沒錢，那遊覽車不用錢，不用加油，不用加油會走嗎？水道水（自來水）難道會走。」

從上面阿玉的發言，我們可以看到，對於 313 造勢活動的成功，阿玉主要是從經費花用的多寡，提出她的論點。她特別從朋友的親身經驗、活動所需的司機費用、遊覽車的租用，及油錢等四個面向去做分析，進而推論，國民黨舉辦這個活動之所以這麼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花了相當多的人力和金錢來造勢，而不是

透過人民自發性參與才達成的。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某個程度來說，阿玉將經費花用這個整體概念，分解為朋友的親身經驗、活動所需的司機費用、遊覽車的租用，及油錢這四個組成元素的作法，就是使用了文字文化的分析式思考工具。只不過阿玉的分析和論述階層只有一個，就是「經費花用」這個概念，不像台灣談論性節目主持人和來賓，會從「樁腳文化」、「組織動員」、「經費花用」、「領袖魅力」等面向做更全面性的評論，並會再就各面向的內涵進行更深度的分析，使其內容變得更為豐富及層次分明。在此，我們將阿玉在議論事物時，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以下表做一說明：

文化工具箱	套語工具箱	文化價值觀	分析式思考
第一階層	俗、諺語	倫常觀念 (晚輩要尊敬長輩)	「樁腳文化」、「組織動員」、「經費花用」、「領袖魅力」
第二階層	自創對仗押韻話語	犯禁忌 (長輩跪晚輩會破病)	

表 4-2：阿玉議論事物時，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

從阿玉議論事情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我們可以發現，在議論事情時，雖然和文字人一樣同時擁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等工具箱，但阿玉還是較「傾向」使用口語偏向文化的「套語工具」及「文化價值觀」等口語文化工具箱，且使用的層次也較深入，像是勸誡孫女時用的諺語「忍氣求財，結氣相殺」，阿玉不只使用第一階層的俗、諺語工具，在後面「自編」的文句(非諺語)「不讓人就有代誌，讓人就沒代誌」，阿玉仍然使用了第二階層的對仗、押韻，顯然阿玉在這部分的使用技巧相當純熟，也具有「自創」押韻對仗語句的能

力；又如在批評宋楚瑜的言行時，阿玉除了談到第一階層中國人所強調的「倫常」觀念外，更進一步說明，長輩跪晚輩所可能造成的破病傷害，顯見阿玉對於台灣民間的一些禁忌³，有相當深厚的認識，而這部分的禁忌知識，可能是許多生活在台灣的文字人都不知道的。

但在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的部分，阿玉雖然也會使用某些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但大部分還是停留在第一階層的工具使用，無法進入到第二、第三階層較專業和深入細緻的概念。像是雖然會使用錄音機、電視遙控器，但對她而言，按鍵功能的使用，是透過位置的記憶而來，她並不真正了解大半按鍵所代表的意義及其運作的原理，她只會使用最簡單的頻道切換功能，所以有時候機器壞了或按錯了鍵，她就不知該如何處理。又如，在分析政治事物時，阿玉工具箱的使用通常只停留在第一、二階層，她的分析概念經常只有一個，像是批評朱高正時使用的「民調支持」概念、批評國民黨時所使用的「經費花用概念」，都只停留在單一因素的說明，且對於民調結果的由來及其他相關數字的意義，無法做更進一步的說明和分析，也沒有民調和政治概念相關的專業知識，不像台灣談論性節目主持人和來賓，會從多個面向進行更有層次的分析和評論。

二、解釋說明

在與阿玉同住的那段期間，由於有許多事物我不太了解，故而經常會向阿玉提問，請她說明和解釋。在她的這些說明解釋回答中，我發現她會從上述的各式思考文化工具箱中，抽取出「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文化工具箱，來為我或其他人，做一些事物的說明和解釋。

至於這些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使用階層與頻次各不相同，一般來說，阿玉在

³ 阿玉知道相當多台灣文化的禁忌，有許多是我一直都不曉得的。像是在拜拜時，阿玉會告訴我，不可放芭樂，因為芭樂是空心，會「ㄉㄚˊ財」（賺不到錢）；在掃墓時不可拜「鳳梨」（旺來），因為掃墓是喪事，當然不希望它旺旺來。關於這些禁忌，我以前是一無所知的。

說明和解釋事理時，較常使用「套語工具」裡的俗諺語和俚語，和所處「文化價值觀」，尤其是，在請阿玉解釋一些我聽不太懂的字句時，通常阿玉解釋的都不是那些字句的字義，而是其在文化情境中的實用意涵；另外，阿玉偶而也會使用「抽象式思考」和「分析式思考」，來說明一些原理原則，及「三段式邏輯推理」來說明其記憶的方式和推理的理由何在。只不過相較於一般文字人來說，阿玉在這些文字文化工具的使用頻次及運用痕跡上，都不是那麼的靈活和明顯。

以下是，我就其說明解釋事物時，所觀察到的各個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情形，舉例說明。

(一) 套語工具

在我和阿玉對談的經驗中發現，阿玉雖然經常使用俗諺或俚語，但使用的時機及功能各有不同。除了用來評論及表達個人意見外，阿玉還會使用俗諺來為我說明和解釋他的想法。像有次她帶我到服裝店老闆家聊天，回來後，我問她為什麼不叫老闆幫她把衣服做美一點，阿玉回說：

「說古，穿太美，豬不就吃藕皮，狗不就吃韭菜尾」。

她的意思是在向我說明，人要認份，要認清楚自己是什麼人，她自己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人，她的身份是個老人，如果穿的太漂亮，豈不是連豬都可以吃蓮藕皮，狗都可以吃韭菜尾，各種光怪陸離的事也可以出現了嗎？而且村人也會笑，所以她選擇穿著一些比較樸素，村人認為適合她年齡的服飾。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阿玉所答的話語，同樣也是使用了「對仗」、「押韻」等套語工具。在「說古，穿太美，豬不就吃藕皮，狗不就吃韭菜尾」一句中，「豬不就吃藕皮，狗不就吃韭菜尾」基本上是以對仗的形式存在的，而藕皮(o pue)和韭菜尾(gu zai mae)，都是押「e」的韻。而這種對仗和押韻的方式，不只是使語言使用者說的順口，也能便於話語接收者的記憶，正符應於口語文化中人的記

憶式思考的需求。

（二）文化價值觀

1.強調事物的實用性

東西有沒有用，對阿玉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阿玉先生在大陸設廠，阿玉偶爾會去那邊小住。有次她談起在大陸的生活，她說她不喜歡住在那裡，因為那裡的人說的話她都聽不懂，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她順便談起說，她也不喜歡大陸那裡的錢。她的這個說法，讓我覺得很好奇，於是問她為什麼，她說大陸的錢在台灣又不能「用」，她不「喜歡」，看了就討厭。幾次談話下來，我才知道，在她的觀念裡，不能用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所以每次回台灣前，她都會把人民幣還給先生。

這種實用價值的想法，在阿玉住家附近的老人身上也可發現。一次阿玉帶我去附近洗髮店去洗頭，因為我的關係，阿玉問起老板娘附近有沒有人沒唸過書，老板娘說，之前那裡還蠻多老人沒念過書，不過後來有人發現，到暗學仔(成人識字班)讀書可以辦學生平安保險，如果生病或是扯斷腦筋(腦中風)的話，保險公司會理賠，可以賺錢，在發現這件事後，村裡的老人就爭相進入小學讀書，希望在生病或死亡時，可以得到大筆的保險金。初聽到此事我覺得很神奇，因為後來繼之一想，也就慢慢可以理解，因為對於這些老人來說，要怎麼在這個情境中生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所以她們會覺得賺錢才是最重要的事。

2.字句解釋著重實用意義

阿玉常在言談說話中使用俗諺或俚語，對於我這個從小就生長在都市的人來說，在理解上有些辛苦，因為常常阿玉說的許多話語我不只沒聽過，而且也不懂它的意思為何，故而經常的，我會要求阿玉進一步為我解釋話語的意思。

在字詞解釋時，我發現阿玉有個特點，即非常著重該字詞在生活使用上的意涵，而非字詞的定義。像是有次她轉述養母罵她的俗諺，「妳是要讓人算貨還是

要讓人算塊」(意思是，你是要讓人家當做是好貨色，還是一塊塊可隨處亂扔的東西)，當時我完全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而且也不知道她的貨和塊到底是那個字(我只聽得懂音，但同一個音可能有許多對應的文字，我不知道 hui 和 dai 這兩個音，到底是指哪兩個字)，於是我問她貨是什麼意思?塊是什麼意思?

結果她不跟我解釋 hui 和 dai 是哪兩個字(我想她可能也聽不懂我在問什麼吧)，也不告訴我這兩個字的字義是什麼，像是她可以告訴我，這個 hui 是貨品的貨，dai 是一塊兩塊的塊，她只是直接告訴我，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個女人，不要嫁過一家又一家。

她這樣的解釋，只告訴我，這句話在她所處情境中，代表什麼意涵，但是我還是不能了解 hui 和 dai 是什麼意思，後來，我將這句話帶回去，問了家中幾個長輩，他們才跟我解釋句中的字詞及字義為何。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在字句說明或是事物價值的判斷上，阿玉所著重的，都是事物在其所處文化情境中，所具有的實用意涵，所以雖然同樣是錢，但是如果不能在台灣這個文化情境使用，阿玉就討厭它，同樣的，對於阿玉來說，語言也是種實際情境中，用來達成各項目的的工具，故而重要的是，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意義，而不是抽象分離的字典意義。換言之，情境式的思考及所處文化的價值，在阿玉說明事理時，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

(三) 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雖然沒有進過學校學過使用文字，但是文字文化的一些習性，也間接的影響到阿玉，像是雖然在符號具和符號義的連接，與我們所定義的不同，但記下十個阿拉伯數字的阿玉，會準備一本「簿子」或幾張紙片，「記錄」親朋好友的電話，以方便在需要時使用。

不過雖然會使用筆記本記錄事物，但是阿玉的電話簿上，只有密密麻麻的一堆數字，沒有文字。有次，我很好奇紙片上的一排數字阿玉怎麼去做記憶，於是就指了幾個號碼問她，這是誰的電話。結果阿玉告訴我，這個電話是她一個住在

附近做衣服的朋友的，因為 699 是她們村裡電話的開頭，如果我們要記其他村裡朋友的電話，只要記後面四個阿拉伯數字就好了；至於另一個電話號碼，阿玉說：

「那個電話是桃園弟弟的，因為它的「開頭」是 03，03 是住桃園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住桃園」。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阿玉會使用一些「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來處理她所面臨的電話號碼記憶問題，而且對於台灣這個電子文化社會，電話資訊如何分類的方法，有一定的認識，而透過「區域號碼」這個資訊搜尋工具的使用，讓她也能很方便的去搜尋和記憶那些，沒有姓名指稱的號碼數字。

（四）三段式邏輯推理

另外，從「那個電話是桃園弟弟的，因為它的開頭是 03，03 是住桃園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住桃園」這幾句話，我們也可以看出，阿玉在說明時，使用了某個程度的三段式邏輯推理的過程。

三段式邏輯推理最著名例子為：「凡人必會死，某人是人，故而某人會死」，如果我們依照這個架構來檢視阿玉說的那段話，「那個電話是桃園弟弟的，因為它的開頭是 03，03 是住桃園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住桃園」，我們可以發現阿玉的邏輯如下：「所有桃園的號碼都是 03，我弟弟的區域號碼是 03，所以這個電話號碼是我弟弟的」。

換言之，阿玉對於其弟電話號碼的記憶說明，某個程度是透過三段式邏輯推理過程而來。故而阿玉某個程度，也會利用「三段式邏輯推理」這個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她在辨視和記憶電話號碼時，所遭遇的困難，只不過阿玉的這個推理過程，似乎不似一般文字人那麼的直接和明顯。

（五）分析式思考

前面談到，阿玉對於自我的認同是自己是個老人，她常說自己是老人了，所以必須表現出一些符合老人形象的行爲。而對於自己的某些行爲，阿玉也會提出一套說法，甚而經常會「自我分析」自己的某些作爲。像是在談到早年的一些故事時，阿玉偶爾會分析自己的個性，阿玉常說自己是個很白目，而且很會回嘴的人，她說：

我從小就很白目了，有一次我九舅他們要割麥仔，齣，他們很遠喔，在阿美(她媳婦名字)家，在姑爺，啊割麥子割到回來快一點了，我阿媽就在那裡煮青草茶，我去把人家撞倒，齣，那次很淒慘，那次我阿媽就追著要打我。

我最會應嘴應舌(回嘴)，我都為了應嘴應舌去讓人家打，真的。我也很會應我養母，啊我養母我若應嘴應舌她也會給我打。說我這樣應嘴應舌，要按怎要去捧人家飯碗，那叫做恰北北(cha bae bae)，那去就搭戰坪(da zam pae)，那跟人家怎麼會合。

在日常生活中，阿玉有時也會分析和說明自己個性所可能造成的後果，像有次我問她，爲什麼不買隻新的手機，功能多又好玩，而且手機買了又很少打，不是很浪費嗎？如果不會用，我教她就好了。結果阿玉回說：

「我老人了，我有的用就好，我方便就好，我也不學，我不太會打，是因為我不學而已，我是會，不過我不需要學，因為我學會了，我會亂打，會打到朋友那裡，我女兒就要多繳錢。我是考慮這樣，那個錢都是我女兒在繳，我是故意不學的，不然有的手機(號碼)，我只要把它寫下，我就會打。」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阿玉對自己的行爲和個性，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也會以「分析式思考」分析自己的行爲。她因爲知道自己會亂打電話，怕造成女兒的

負擔，所以刻意要求自己，不要學會手機的使用功能，也不要記下太多的手機號碼，以免到時候她亂打，使得電話費暴增，害女兒要多繳錢。

（六）抽象思考

由於經常看電視戲劇節目，阿玉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媒體素養概念，像有次我們在看電視，因為先前沒看過那部連續劇，我就問起她劇中人物及劇情相關事物，結果她不只為我做說明，還會告訴我，接下來劇情會怎麼發展，我問她怎麼知道，她說，台灣的連續劇她看很多了，都知道怎麼演了，一定是這樣演的。顯然阿玉也具有某個程度的編劇能力了。

另外，也因為經常收看電視的歌唱比賽，透過長久觀摩評審所給的評語，及要求參賽者須要改進的地方，阿玉也自行歸納出一套參賽得獎的原理原則，像是每次參賽者一演唱完畢，阿玉就會開始下評語：「這個不會得等(得名)啦，他剛才唱的時候嘴巴不夠開，手的動作太小，對嘴的時間沒有抓好」，我問她說，那要怎樣才會得等，她說：

「嘴要張大一點，手的動作要較自然啊，對嘴的時間要剛剛好，這樣才會得等啦！」

從阿玉的這些說法，我們可以看出，她從長期觀看評審的給分標準中，得出了一套競賽標準的原理原則。也利用這套原理原則，自己扮演起裁判的角色，為所有的參賽者評分。

事實上，阿玉所提的這些劇情預測或原理原則，並不是評審在說明比賽結果時，很有系統依序一項項提出，因為在陪阿玉觀看電視的過程中，我發現，評審對於參賽者歌唱對嘴表現行為的評論，經常是以個別散漫的方式呈現，沒有一定的標準，且節目中每次請的評審都不相同，每個評審的表達及評判標準也不太一樣。換言之，如果阿玉只是不經思考，依樣畫葫蘆的提出一些評語，那麼很可能她每次說的評審標準都不太一樣，且她也不會興緻勃勃的，去做些預測的動作。

我想，阿玉之所以可以提出「嘴張大一點，手的動作要自然，對嘴的時間要剛剛好，才會得等」這個得獎的原則，主要是因為她長期觀看這個節目的經驗，及針對評審所提供資訊，所做的分類與歸納，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分類與歸納的動作的話，阿玉是提不出什麼得獎標準的。

在第三章有關文字文化工具箱的說明時，我們曾經談到，抽象思維能力最重要的一項重點，即是尋出事物的共同屬性，並進行分類。阿玉在得獎原則的說明上，確實是做了這個動作，故而在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部分，阿玉某個程度的使用了「抽象式思維」這個文字文化的工具箱。

在此，我們將阿玉在解釋事理時，不同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以下表做一說明：

口語偏向文化工具箱	套語工具	文化價值觀
第一階層	俗、諺語	實用價值
第二階層	自創對仗押韻話語	

表 4-3：阿玉說明事理時，口語偏向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

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	分析式思考	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抽象式思考	三段式邏輯推理
第一階層	個性說明	數字記錄	原理原則說明	不明顯的三段式邏輯推理

表 4-4：阿玉說明事理時，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

從阿玉說明和解釋事理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我們可以發現，在說明事理時，雖然和文字人一樣同時擁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

等文化工具箱，但阿玉較常使用的還是口語偏向文化的「套語工具」及「文化價值觀」工具箱，尤其是在請阿玉解釋一些我聽不太懂的字句時，通常阿玉解釋的都不是那些字句的字義，而是其在文化情境中的實用意涵。另外，阿玉對於這些口語偏向文化工具箱使用的階層也較為深入和熟練，故而即使在自我分析時，阿玉還是不自覺的使用了第二階層自創的「那叫做恰北北，那去就搭戰坪」，這句既押韻又對仗的套語工具來做說明。

但是在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的部分，阿玉雖然使用了「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文化工具箱，但大部分還是停留在第一階層的工具箱使用，不太具有第二、第三階層較專業和深入細緻的概念，像是在「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部分，阿玉雖有屬於自己的電話簿，但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分類概念及文字工具，所以阿玉的電話簿上通常只出現一長串的數字，沒有一個類似一般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關係」等概念所做的分層、分類有效記憶與使用系統；又如雖然會使用「三段式邏輯推理」這個文化工具箱，解決辨視和記憶電話號碼時所遭遇的困難，但阿玉的三段式邏輯推理過程，似乎不似一般文字人那麼的直接和明顯。

三、故事敘述

在前面我曾經談到，除了觀察其口語表達行為外，我還會請阿玉敘述她早年的生活經歷及其個人故事。在觀察她的故事敘述時，我發現她會從上述的各式思考文化工具箱中，抽取出「角色扮演工具」、「套語工具」、「分析式思考」等媒介文化工具箱。

至於這些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方式與頻次各不相同，一般來說，阿玉在故事敘事時，較常使用參與式思考的「角色扮演工具」、「套語工具」和「文化價值觀」，尤其是，阿玉在談及自己與他人間的互動時，常常會不知不覺以轉變聲調的方式，扮演起對方的角色；另外，阿玉偶而也會使用「分析式思考」來做分析別人話語的隱涵意義，及自己個性特質的說明，只不過這兩個文化工

具箱，在阿玉敘述自己早年個人經歷時，較少使用。

以下是我就其故事敘述時，所觀察到的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舉例說明。

(一) 角色扮演工具

阿玉說故事有些特色，非常吸引人，聽她講故事，常常讓我覺得好像在看戲。像是在敘述早年的故事時，她會不斷的變換聲調，許多時候，我是從她的聲調中去辨識她現在在扮演誰。不像我們習慣以敘述，偶爾穿插一些引語的方式來做描述，或是會在使用引語時加註某某某說，或是某人回答說的前註詞，阿玉常常在說話時，直接變聲調，不會先說現在是誰在講這些話，害我必須要很認真留心的去聽她的聲音，有時候稍一閃失，我就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又要叫她再重說一遍。

像是她在跟我談到初嫁到先生家兩點爬起來煮飯時，卻發現大嬸已在廚房忙碌時，她急忙問大嬸：

「嫂子嫂子，我問某人說兩點起來煮就來得及，妳怎麼這麼早就起來煮？」，「怎麼樣妳甘知？」（她問我，我還來不及回答，她接著就變尖銳聲音說）「人家好命可以睡飽飽，我吵妳無眠，我吵妳無眠這麼早起來，妳快去睡飽飽」（停頓一秒鐘）「齁，快要嘔死就哭了，到房間哭在那裡嘔，怎麼嫁尅這麼壞命，我剛初來都還不認識，妳為什麼要這麼嚴厲虐待我」。

我初時聽不太懂她在說什麼，後來聽久了也慢慢習慣了，再加上回家後聽錄音帶一段段分析才知道，她有時在扮演自己，有時又變聲扮演大嬸，爲了增加與聽者的互動，她還會不斷的詢問聽故事的人，接下來可能會有什麼發展，最後還會下評語，講些自己內心的獨白，所有這些資訊的轉換，全部都是靠語氣的轉換，沒有任何的連接詞或前面的提示。

另外一個讓我覺得她像在演戲的特色是，我發現她說故事的用詞，非常的文

言簡短又準確，有時甚至會使用一些戲劇性的台詞。像是在談到公公跟她說要分食，問她說：「某某人，人家說要分食，妳要不要分？」她回答公公說：「阿爹，我也沒生子男兒，我一個人而已，我怎麼有資格說要分還是不分」。這樣的話語，就像是台灣早期歌仔戲的對答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很少會使用類似像「生子男兒」這樣的詞彙。

阿玉講故事還有個特色，就是她會神入、移情的扮演當事人，假設聽故事的人已熟悉故事中的人事物，直接將故事中人的名字說出，後來再做附註說明，有時根本就不理會我認不認識她所說的人物，在轉述時，就直接扮演自己的角色，叫出對方的名字。像是在談到大嬸說她跟大伯有染，他們請來幫忙的人為她抱不平時，她說：

我們有請一個女人一起幫忙，那個女人說（變聲，拉高聲音）哎哟，月琴啊，（變聲，以平時聲音說），我大嬸叫做月琴，（變聲，拉高聲音）哎哟月琴啊，妳不要這樣，妳不要亂講話，妳說的都不對，妳不要亂講話，妳會被打死，會死的，那打下去會死的，妳這樣難怪被人家打，妳都亂講話，講的都不是話，妳不要這樣，我今天來聽到，妳說的都不對，人家阿玉啊，（變聲，以平時聲音說）我名叫阿玉啊（我那時候不知道她的名字），（變聲，拉高聲音）她也沒怎樣，她問說要做什麼也沒有什麼不對啊，人家她好嘴問他，是小嬸啊，對不對，她好嘴問他，他好嘴應她，也是對的啊。

阿玉這些說故事的特色，就如同前面 Brewer(1985)談到的，口語文化敘事特色，主要是透過「表演展示」(showing)而不是敘述(telling)的方式來做說明。而阿玉之所以會以這樣的方式敘事，是因為使用了口語文化的「角色扮演工具箱」，故而她在敘事說明時，才會以這種神入、移情的方式呈現。

(二) 套語工具

另外，在個人生命經歷的敘述時，阿玉曾談到早期離家出走時，養母訓誡她的情形。她說當時自己因為跟婆婆吵架，忍不下那口氣，就跑去找村長仲裁，結果村長特地載她養母來調停，沒想到養母一來就對她破口大罵，阿玉轉述當時養母罵她的話說：

「妳是要被人算貨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

養母的意思是要她忍耐，要當個好貨色被人尊重，不要像是一塊一塊的東西，嫁完一家再嫁一家，沒有個好的歸依。後來，養母罵完她後，又帶著她去跟婆婆道歉，沒想到這裡婆婆反而不好意思，覺得自己罵媳婦罵得太兇了。

在此，我們先將「妳是要被人算歲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是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這段話，翻成羅馬拼音來看：

Li Si mai hon zan sum hui	a si mai hon zan sum dai
Kon kwe a dio e	Fan su dio lin nai
Lin nai dio li e	
Li na lin nai me diau	Li dio lian whe

從上面這段話語的中文及羅馬拼音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段話語中運用了相當多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像是「妳是要被人算歲，還是要被人算塊」就使用了「對仗」這個套語工具，而算塊、就會、你的、連回等字，如果從閩南語的發音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押「e」的韻，也利用了「押韻」這個口語文化工具箱。

另外，在這段話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文學及套語技巧的使用，像是「凡

事著忍耐，忍耐就你的」，就是透過「忍耐」二字的尾和頭相頂的位置，使用了文學上所說的頂真技巧；而「凡事著忍耐，忍耐就你的，你若忍耐不住」不斷「重複」忍耐二字，讓聽話的人很自然的就會捕捉到這整段話的重點，就是叫聽話者要「忍耐」。

換言之，阿玉之所以對於養母的這段話語可以記得這麼住，並不是因為阿玉用心去聽和去記養母的每句話語，而是因為透過對仗、頂真、重複，押韻等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的使用，使阿玉對於這些話語的內容更容易記憶，也透過這些文化工具箱的使用，讓阿玉能夠更容易得知養母話語中的重點為何。

阿玉在說故事時的這個口語表達特色，在其他報導人身上或多或少也都看得到。像是同樣也是七十多歲，住在台中外埔的吳嬭，在談到早年與公婆及小叔、大伯同住，因為受不了每天要做很多工作，就回家向父母親哭訴的事。她轉述父親當時勸她的話：「沒關係，卡忍耐，兄弟不能吃一輩子，兄弟永會分食，會作伙是卡久，沒作伙是卡快，兄弟永會分食，古人說忍耐就是我們的」，而她也借由父親引用的那句勸誡的俗諺「兄弟永會分食」，來說明後來她繼續忍耐呆下來的原因。

（三）分析式思考

另外，阿玉敘說其早年故事時，偶爾也會分析一些他人話語的隱含意義，像是在談到養母帶她回婆家跟婆婆道歉時，阿玉轉述養母的話說：「親家母，這個孩子就不會想，我把她帶來了，我把她罵一罵，就那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結果她婆婆反而不好意思的說：「對啦，我看到這樣我不甘，我有跟她說得比較難聽對啦」，阿玉接著就分析說，「我婆婆這樣說，雖然沒有明講，但是我養母立刻聽懂我婆婆在道歉」，就說：「對啦，這個女孩就是比較笨，也不是故意的，原諒她一次吧，我叫她下次要小心一點」。

而這樣行爲，也出現在其他報導人身上。像是在談到早年的人生經歷時，吳嬭談到，當時因為先生去當兵，不知該做什麼，只得去詢問大伯，結果惹來大嬭

的不快，說了一些閒言閒語，她當時對這些閒言閒語的說法是，「當時我大嬸話雖然沒有說那麼明，意思是我偷到我大伯，但是，她的話就是有這個意思」，換言之，其實她已在分析大嬸說話的內涵意義，且在這個過程中，做了進一步推理。

在此，我們將阿玉在故事敘述時，媒介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以下表做一說明：

媒介文化工具箱	角色扮演工具	套語工具	分析式思考
第一階層	聲調轉換、手勢與表情的扮演	俗、諺語	話語內涵分析
第二階層	關鍵性對話、擬聲詞、戲劇對白	自創對仗押韻話語	

表 4-5：阿玉故事敘述時，文化工具箱的階層使用情形

從阿玉故事敘述時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我們可以發現，在說故事時，雖然和文字人一樣同時使用「角色扮演工具」、「套語工具」、「分析式思考」等文化工具箱，但阿玉較常使用的，還是口語偏向文化的「套語工具」及「角色扮演工具」工具箱，且使用的層次也較深入。

像是在談到自己的早年經歷，阿玉隨口「自編」的養母罵她的話語「妳是要被人算貨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就使用了套語工具箱中第二階層的對仗、押韻、頂真、重複等多個文化工具，顯然阿玉在這部分的使用技巧相當純熟，也具有自創押韻對仗文句的能力；而在談到大嬸說她跟大伯有染，他們請來幫忙的人為她抱不平時，在敘述這「一長串」的對話過程，她幾乎不使用任何的旁白，完全只以轉換聲調這個角色扮演工具，讓聽者了解其對話內容，可見使用其技巧之純熟；又如在談到公公跟她說要分食時，她所使用「生子男兒」等詞彙，即是利用了角色扮

演工具「第二階層」的歌仔戲對白。

或許有人會說，文字人在故事敘述時，也會使用這些聲調轉換、套語等工具，但一般來說，文字人在故事敘述時，通常是以旁白的方式呈現(Brewer, 1985)，聲調轉換工具雖然也會使用，但所佔的比例相當少，且通常只有在關鍵字句時才會出現，很少有文字人會如阿玉這樣，整段對話都以這個工具呈現。

另外在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的部分，阿玉雖然使用了「分析式思考」這個文化工具箱，但相較之下，其使用的頻次和階層大部分還是停留在第一階層的工具箱使用，並沒有用一些更次層的概念和理論加以延伸說明。像是在談到養母帶她回婆家道歉時，阿玉分析當時婆婆話語的隱含義說，「我婆婆這樣說，雖然沒有明講，但是我養母立刻聽懂我婆婆在道歉」，但在做此分析推論時，阿玉並未使用更次層的概念和理論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第四節 阿玉表達行為特色

一、混血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使用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發現，阿玉口語表達行為中最大的特色為，充滿著大量台灣民間流傳的俗語、俚語和諺語，這些諺語是阿玉生活中一項很重要的說話工具，有時阿玉會用它們來評論事情、有時用來訓誡他人、有時用來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時則將它溶入故事的敘說當中，使用的時機和功能都不相同，阿玉卻有辦法將它運用的相當巧妙，像是渾然天成一樣。這種同一文化工具，具多重功能現象，就如同 Brewer(1985)所述，在口語傳統中，為了便於行事，許多敘事同時會執行多項功能，故而單一的口語文化敘事，可能同時達成多種文類功能。

另外在故事敘述時，我們也看到，阿玉經常使用「角色扮演工具」這個文化工具箱，以一些聲調轉換、增加表情和手勢等輔助工具述說故事，以強化故事的生動性；而對於事物的評價和字句的解釋，阿玉會大量使用「文化價值觀」這個文化工具箱，提出評論或自己的看法，至於對於字詞的解釋，較著重於生活運用意涵而非定義。

不過，在阿玉的口語表達行爲及故事敘述過程中，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她對於文字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像是阿玉會利用「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等文化工具箱，來做些政治時勢的評論、劇情及評審標準的說明、資訊搜尋的過程說明等。

總結來說，不識字的阿玉，在口語表達時，不只會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箱」來達成其目的，同時某個程度，也能有效的運用文字/電子文化的「分析式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資訊搜集與記錄」等文化工具箱，來達成其意圖。

而如果我們回到前面的解釋架構來看，確實，不同的媒介文化，會提供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表達行爲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所以生活在一個「口語文化」和「文字/電子文化」混血的環境下，透過混血文化情境的激發，阿玉可以同時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及文字/電子文化的「三段式邏輯推理」、「抽象原則」、「分析式思維」、「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等文化工具箱，來解決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各式困難，並達成其意圖。

換言之，不識字的人，不見得如 Luria(1976)所說的，沒有分析、抽象和邏輯等思維能力，因為就如同 Ong(1982)所說，是整體的媒介文化環境，而非單一媒介工具的使用，形塑了這些文化工具箱，故而長期處在文字/電子文化環境下的阿玉，即使不使用文字這個媒介做爲思維工具，也能擁有某些文字文化的思維工具箱，像是「分析式思考」、「抽象性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

當然這樣的概念一點也不稀奇，因為就同前面我們曾談到，所謂的媒介文化概念，是處於一種漸層混血的狀態，即便在單一文化中，仍有各種多元不同的媒介文化樣態存在。事實上，在單一個人身上，同樣也存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媒介文化影響力，故而即便是台灣那些土生土長於文字/電子時代的七、八年級生（即民國七、八零年代出生），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中，也還會殘留著口語文化的一些遺跡，例如：成語的使用或是某些口語文化所流傳下來的祭拜習俗。

二、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偏向

雖然阿玉在口語表達時，同時會使用「口語偏向文化工具箱」和「文字/電子偏向文化工具箱」來達成其意圖，不過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生長及生活在文字/電子文化中人，阿玉在使用文字/電子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的頻次與使用階層及技能上，仍較土生土長於文字/電子文化的文字人來得少及差。

例如：雖然有本屬於自己的電話簿，但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分類概念及文字工具，所以阿玉還是停留在工具箱第一階層的使用，其電話簿只出現一長串的數字，不太使用第二、第三階層較深入細緻「姓名」、「出生年月日」、「關係」等概念的分層、分類系統概念，幫助號碼的記憶與使用；又如，雖會使用「三段式邏輯推理」這個文化工具箱，解決辨視和記憶電話號碼時所遭遇的困難，但阿玉的三段式邏輯推理過程，似乎不似一般文字人那麼的直接和明顯。

但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頻次與階層及技能的使用上，又較識字人來得多且好些，像是阿玉日常生活中不時出現的俗、諺、俚語，和她即興創作⁴「妳是要被人算歲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是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的話語，就使用了套語工具箱中第二階層的對仗、押韻、頂真、重複等多個文化工具，顯然阿玉在這部分的使用技巧相當純熟，且具有自創對仗押韻話語的能力；又如在談到大嬸說她跟大伯有染，他們請來幫忙的人為她抱不平時，在敘述這「一長串」的對話過程，她幾乎不使用任何的旁白，完全以轉換聲調這個第二層次的角色扮演工具，讓聽者了解其對話內容，可見使用其

⁴ 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我曾經採訪一個八十幾歲的文盲，她是個愛唱歌的老人，我去採訪她時，她邀我在她家一起唱卡拉OK，因為不會說國語，她唱的大半是閩南語歌。不過雖然不識字，但是每首歌的歌詞和韻律節奏，她都記得很牢，不會出錯，在看她唱歌時，我常會懷疑她是不是騙我不識字，因為她唱歌的節奏及歌詞，是跟電視螢幕下方出現的字幕完全一致，再加上我自己在唱歌時，通常會跟著這些字幕出現的標誌唱，所以當她的歌聲與字幕一致時，我真的有種錯覺，她是識字的。在我要回家時，她告訴我她自己創作了好幾首歌，並唱給我聽，她寫的歌也是閩南語歌曲，而且每首歌詞都押了韻，我那時非常驚訝，心裡想，我們一般識字的人，雖然受過那麼多的文字教育，但有沒有能力從事詞曲創作都是個問題，何況是將每句歌詞都讓它押韻了，這似乎已達到一個專業詞曲創作者才有的水準。

技巧之純熟。

換言之，文字/電子人和文字時代口語人最大的不同，可能只在於媒介文化作用力大小、文化工具箱使用的偏向及處理階層的深淺罷了。由於早年生長在一個口語偏向文化及目前生活在口語和文字/電子偏向文化的環境中，故而這些文字時代的口語人，受到更多口語文化作用力的影響，在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的連續集中，較偏向口語文化的極端，也使其工具箱的選用較偏向口語文化工具箱，至於那些土生土長於電子文化中人，則較偏向電子文化的極端。

所以在議論事理時，雖然同樣擁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等文化敘事工具箱，但是生長在口語文化情境的阿玉，相較於生長在文字/電子文化的文字人而言，更習慣於選擇使用「套語工具」和「文化價值觀」這兩個口語文化工具箱，來評論及表明自己的意見，而不是以文字人習慣的分析組成元素，分層列點的說明方式，來評論事理；也因其慣於使用口語文化工具箱達成表達意圖，在經常實作練習的情況下，其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技能和層次也較熟練及深入，像是阿玉「自編」的文句(非諺語)「不讓人就有代誌，讓人就沒代誌」，就使用了第二階層的對仗、押韻，顯然阿玉在這部分的使用技巧相當純熟，也具有自創押韻對仗話語的能力；又如在批評宋楚瑜的言行時，阿玉除了談到中國人強調的「倫常」觀念外，更進一步說明，長輩跪晚輩所可能造成的破病傷害，顯見阿玉對於台灣民間的一些禁忌，有相當深厚的認識。

而在事理說明時，雖然也許同樣擁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三段式邏輯推理」、「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等文化工具箱，但相較於生長於電子時代的文字人，阿玉更習慣於選擇使用「文化價值觀」、「套語工具」這兩個文化工具箱，來說明事物的實用意涵，而不是以一種去情境的字詞定義方式，來說明字句的意義；也因其慣於使用口語文化工具箱達成表達意圖，在經常實作練習的情況下，其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技能和層次也較熟練及深入，故而即使在自我分析時，阿玉還是不自覺的以自創「那叫做恰北北，那去就搭戰坪」這句既押韻又對仗的套語工具來做說明。

在故事敘述時，雖然也許同樣擁有「套語工具」、「角色扮演工具」、「分析式思考」等文化敘事工具箱，但是生長在口語文化情境的阿玉，相較於文字人，可能更習慣於選擇使用「角色扮演工具」這個文化工具箱，以聲音轉變，豐富的手勢、表情的扮演方式，來表演及展示故事，而不是以文字人習慣的分離、分析的敘事方式，來敘述故事(Brewer, 1985)。也因其慣於使用口語文化工具箱達成表達意圖，在經常實作練習下，其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技能和層次也較熟練及深入，像是在敘述「一長串」的對話過程，她幾乎不使用任何旁白，完全以轉換聲調這個角色扮演工具，讓聽者了解其對話內容，可見使用其技巧之純熟。

第五節 媒介文化工具箱對阿玉的影響

前面談到，透過混血文化情境的激發，阿玉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為中，可以同時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及文字/電子文化的「三段式邏輯推理」、「抽象式思考」、「分析式思考」等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她所遭遇到的困難，並達成口語表達時的意圖。然而，在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同時，阿玉是否真的如此自覺，是件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以前面阿玉轉述養母的話「妳是要被人算歲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是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為例。在上面分析中，我們曾經談到，阿玉使用了口語文化的對仗、重複、頂針、押韻等套語工具，以使得這段話語更便於記憶。

然而沒讀過書的阿玉，是否真有能力在說話時思考，現在說這段話，我要用「對仗」，下段話我要用「頂針」，再過來還要使用「押韻」的技巧，這樣別人才可能記得住？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在她的頭腦裡根本沒有所謂的「對仗」、「押韻」等概念存在，這些技巧的出現，應該只是受過文字教育的我，所加諸於她身上的分析罷了。而她之所以會以這樣的方式做語言表達，也非是她「有意識」的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呈現，而是她的日常生活，就是以這種「富韻律節奏」的方式在進行著，這就是她的生活常態。

換言之，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在其日常生活口語表達時，正不知不覺在影響著她，才使得她的話語得以出現對仗、押韻、重複等情形出現，只不過她並不那麼意識到這件事。

當然，這種文化工具箱對於口語表達行為的影響，不只顯現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同樣也出現在阿玉對於文字文化工具箱的使用上。在阿玉說明其對弟弟電話辨識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阿玉某個程度使用了「三段式邏輯推理」的文化工具箱，來協助她解決我所提問的號碼辨視問題。

然而在說話的當下，甚而是其後，阿玉是否意識到自己正使用「三段式邏輯推理」這個文化工具箱，她是否意識到所說的那些前提(03 是住桃園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住桃園)，正不斷導引她走向得出某個結論的路徑(所以這個電話是我弟弟的)。答案當然也是否定的，因為對於什麼是三段式邏輯推理，阿玉甚至還不具有這樣的概念，這個概念純然是我加在她身上的。而在收到我所提問的號碼辨視問題時，阿玉之所以會做這樣的反應，也不過是她無意識的一種思考方式罷了。

故而，就如前面本文解釋架構所述，在日常生活中，雖然我們利用了各式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同時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反身回來，影響到我們的思考及表達行為，使我們的思維及生活方式，以某些韻律的方式運作著，讓我們以某種思維方式生活著，習慣性的從事某些歸納或推理的過程，得出某種結論，並將這些結論套用在週遭的人身上，但這種影響卻不是那麼容易被發覺的。

這種狀態就如我在文章一開始所引 McLuhan 的名句：「媒介就是訊息」一詞的意涵，即媒介工具的使用，對我們的思維及日常生活的表達行為造成重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卻不見得為我們所知覺，故而才會使得阿玉在口語表達中，不自覺的使用各式富韻律節奏的「套語工具」，甚而在說明電話號碼的記憶及辨視時，也以「三段式邏輯推理」方式推理，而不自覺。

只不過在此文中，媒介不再只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物質概念定義，而是一種媒介文化環境下的產物，它是具有文化意涵的文化工具箱，與其所處的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

總結來說，從阿玉的個案說明，可以回應到本文所提出的解釋架構，亦即：

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為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限制及影響人們的所思所為。